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羊城晚报社 共青团广东省委

联合出品

专题统筹:张棣 温建敏

从“团一大”到大革命:

□张棣 袁卫根

中共党团组织推动大革命在广东策源并影响全国

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团一大”，是中共党团组织创建史上一次公开而影响大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里程碑。大会不仅凝聚了青年力量，也开启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先声。从“团一大”到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带领青年团打开了领导革命运动的空间，一场中国大革命的风暴在广东策源并影响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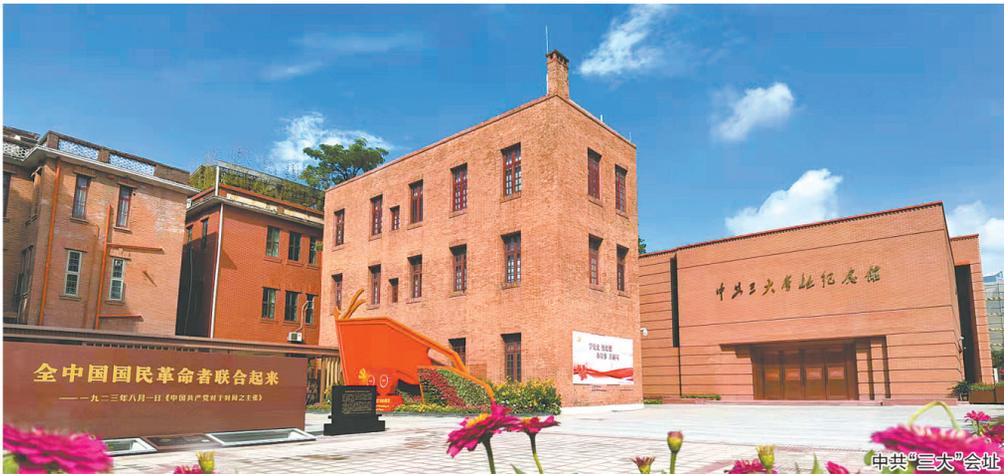
“团一大”开启了联合民主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先声

中国共产党是肩负着中国近代以来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使命而诞生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先进政党。然而，党在创建之初，力量十分薄弱，党要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要建立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探索过程，在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考察中，党逐步改变了一大“不与其他政党发生关系”的立场，适时调整政策。“团一大”则开启了联合民主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先声。

促使党这一认识转变的外部因素，源自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会议特别阐释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还接见了国共两党的代表，敦促两党尽快合作。为落实这一会议精神，1922年4月底，陈独秀、邓中夏、张太雷等中共党团的主要负责人20多人云集广州，召开了广州干部会议，着重讨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以及联合民主政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标志着党在思想上的转变。

促使党这一认识转变的内在因素，是广东党团组织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得益于广东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广东党团组织善于在与国民党人的合作中打开活动空间，广东青年团在整顿重建中发展迅速。至1922年5月“团一



中共“三大”会址

大”召开时，广东青年团的人数几乎占据了团一大召开时全国5000名团员人数的1/2以上。同时，香港海员工人爆发，广州革命政府、广东党团组织都予以大力支持，广东的工人运动也走在前列。这是影响党团中央决定把“团一大”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两个重要会议同时放在广州召开的重要原因，其中也蕴含着党借机考察广东、为即将开展的重大政策调整厘清依据的考量。

促使党这一认识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团一大”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广州宽松的政治环境，两个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使党团中央对孙中山主政广州的革命场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推动党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和突破，并体现在“团一大”的纲领和政策中。

“团一大”的《团纲》首次鲜明提出了“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一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纲领；“团一大”首次制定《中国社会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指出，“对于各种社会主义团

体，应与之结成共同的战线”。同时，《议决案》还强调指出，“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则应采取援助的态度”。

这些理论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党对民主革命纲领的探索和对统一战线问题的思考，是党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开启了党对民主革命政党态度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为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奠定了重要基础。

因此，广东党团组织的早期革命实践与探索及“团一大”在广州召开，为党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也推动党的革命视野南移。“团一大”不仅开启了与民主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先声，也开启了广东作为中国大革命策源地的先声。

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大革命在广东策源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

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以“统一战线”为主题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规定“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独立性”的原则。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革命运动中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有着重要意义。

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走上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党领导青年团广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发挥了中共党团的组织优势，书写了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光辉历史，彰显了“统一战线”的巨大价值。

中国大革命在广东走向高潮并影响全国

中共“三大”以后，中共党团组织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以广东为策源地和中心，推动了中国大革命走向高潮进而影响全国。

首先，中共党团组织积极帮助国民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孙中山曾说：“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片散沙。”中共党团员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改组，迅速在全国各地恢复或重建国民党组织，经过组织审核、党员重新登记，使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得到重组。同时，中共党团员也因其先进性表现，被选进国民党的各组织机构。如，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任职，杨匏安、冯菊坡、彭湃等也都在国民党组织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并发挥重要作用。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就是一道“新鲜血液”让国民党重焕新生，再重新凝聚起来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先进力量。

其次，中共党团在帮助国民党改组重建的过程中，也高度重视自身党团组织的建设。中共广东区委，是全国最重要的地方党组织之一，党中央相继选派了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一批精英人才汇聚广东，广东区委很快完善组织机构，设立了青年运动委员会，还最早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广东区委还加强对粤东、粤南、粤西、粤北等地区的建立党团组织，广东党团组织是全国范围最广、战斗力最强的地方党团组织之一。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力量的不断加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东大革命迅速在南粤展开。

在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工作

和学习，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有56名，占学生总数的1/10。周恩来、熊雄等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主导了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大大提升了国民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并迅速取得两次东征的胜利。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曾主持农讲所，重视政治教育，共培养农运干部近800名，学员毕业后，都成为农村党团组织的重要骨干，促进了农民运动迅猛开展，也为北伐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广东的工人运动发展更为迅速。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随即推动掀起全国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东党团组织迅速行动起来，派邓中夏、杨匏安、杨殷等赴香港和苏兆征一起依靠香港的党团组织，动员香港工人罢工。随即，在广东和香港掀起了著名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历时16个月，前后有25万余名工人参加，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省港大罢工把以广东为中心的中国大革命推向高潮。

在北伐战争中，广东党团组织动员工农民众，组织运输队、交通队、宣传队等积极支持北伐战争，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

澎湃的中国大革命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及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中国青年团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党步调保持一致，共同发展形成合力，成为推动大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

由上可见，“团一大”撬动了中共党团组织的“统战思维”，中共“三大”的“统一战线”决策又撬动了一场以广东为策源地和中心的中国大革命，“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打开了领导革命运动的空间，也成为中国革命舞台一道绚丽的光彩，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法宝。

(张棣: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袁卫根: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和青少年融媒体中心主任)

广东党团组织活动空间的打开与党团中央革命视野的南移

□沈志刚 王玉云

中共党团的早期创建和发展与社会政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922年5月团一大在广州召开，虽直接缘于谭平山的一封信，但背后却有复杂的历史与政治原因。广州在当时宽松的革命政治环境、广东党团早期组织的发展与活动空间的打开，以及党团中央和共产国际革命视野的南移等几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党团中央移会广州的决策依据。

广州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全国独树一帜

中共党团创建时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革命力量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并指派陈独秀、袁振英等于8月22日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创办“外国语学社”作为团机关的掩护。然而没过半年，外国语学社便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不久便停办了；社址离此处不远的“新青年社”，也在1921年初遭到租界当局的查封；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中共一大，无论是筹备过程还是会议安排都已经谨慎之至，但还是被租界当局的暗探所侦知，中途移会嘉兴南湖……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都发轫于上海，但上海的政治环境对于革命运动的开展却窒碍诸多。

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革命气象。1920年10月，粤军自漳州反赣，赶走了统治广东数年之久的桂系军阀，孙中山建立了崭新的革命政权，重新赋予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等种种政治自由，可以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广州革命政府还公布了《广东省工会议法草案》，支持工人运动。这为广东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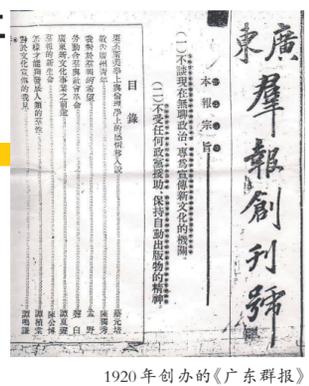
广州革命政府为了进一步复制桂系军阀主政广东时所造成的文化繁荣，决定邀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东的教育事业。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9年6月曾因散发爱国传单而遭北京当局逮捕，次年2月于武汉演讲俄国革命时又遭军警粗暴驱离，此后便被北京暗探严密监视，在李大钊的巧妙护送下才得以离京。广州政府对陈独秀的欢迎，与北京政府对陈独秀的忌惮形成了鲜明反差。

广东党团组织的发展与活动空间的打开

广州宽松的革命环境是党团中央决定将团一大举办地迁粤的重要考量。不过，举办全国代表大会并非易事，对举办地党团组织要求很高。上海党团中央决定采纳谭平山的建议移会广州，反映了他们对广东党团组织活动能力的了解和信任。

党团中央、共产国际革命视野的南移与团一大在广州召开

陈独秀对广州的关注由来已久。



1920年创办的《广东群报》

早在1920年2月，他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便曾指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灼，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悲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可见他对广州革命前途的看重。1920年11月，陈独秀到广州当局邀请之际，他已领导完成了上海党团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在与李大钊等人商量之后便决定南下，希望在南粤大地上开拓新的革命局面。

陈独秀到粤以后，主导了《广东群报》的改版，增加了宣传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内容，并附办了《劳动与妇女》杂志。随着《新青年》的南迁，更加凸显出广州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上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李大钊、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瞿秋白等众多党团早期重要的理论人才，均有很多文章寄来广州发表。也正是在广州，《新青年》才真正实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刊物到党的机关刊物的华丽转型。伴随着各地党团成员革命视野的南移，广州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

1921年底共产国际远东战略的调整突显出广州的重要革命地位。1921年下半年，共产国际调整了远东战略，决定在中国加强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关系。1921年底，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亲自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山谈合作事宜，途经广州时也呆了十天。此时正值香港海员工人爆发，广州的革命空气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兴奋地说道：“我在南方才发现问题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1922年4月6日，苏俄驻远东全权代表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工作时，计划通过在广州举办团一大，为党团今后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基础”。这里已经蕴含了为即将开展的国共合作开路的用意。

团一大在广州的召开貌似偶然，实则却有其必然性。谭平山的一封信请来了团一大的背后，与广州在当时独特的政局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广东党团组织周旋的接待与安排下，团一大的举办十分成功。众多党、团骨干人才在羊城的会聚，开启了广东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历史进程。

(沈志刚: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团一大历史特聘研究员;王玉云: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青年先锋担当使命 书写共青团百年芳华

□梁道刚 陆智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五四爱国运动锻造了一批中国青年先锋，他们承担着近代以来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团一大”的大会上发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先锋队(更是:敢死队)”的宣言。中国共青团自诞生之日起，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充当青年先锋，担当使命、团结凝聚青年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团一大”青年代表会聚东园，凝聚共识

“团一大”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精神的引领，有了明确的纲领和目标，有了组织章程和组织领导机构，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组织上完成了统一，凝聚了共识。

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其目的是“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代表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是为无产阶级尤其是为无产阶级的青年而奋斗的团体，需要为改良青年工人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他们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同时指出，“这种奋斗的道路并非直径的”，明确了当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路线方针，以期达到最后的目的。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奋斗目标。政治方面，要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享有选举权和言论、出版等方面的绝对自由权等。经济方面，主要有提高工人待遇、改良工作环境、争取男女待遇平等。教育方面，则提出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宣传，启发广大青年的社会觉悟和政治觉悟等。

青年先锋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壮丽篇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青年

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成为党的得力助手。1925年1月“团三大”正式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青团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始终与共产党保持步调一致，投身社会革命实践，发挥青年先锋作用，汇聚青年力量，在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大革命中，中国共青团积极贯彻统一战线方针，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不少共青团员参加黄埔军校、农讲所，群众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团组织还积极发动学生开展非基督教运动、废约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参与五卅运动。在支援东征和北伐中，也留下了青年先锋勇当“敢死队”的身影，为中国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无数优秀的青年先锋，坚守理想，忠诚于党，担当奉献。蔡和森、邓中夏等青年精英，以及大革命时期在各地开展革命运动的青年先锋，如曾经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杨匏安、陈延年、恽代英、熊雄、肖楚女、阮啸仙、刘尔崧、周文雍等青年精英，都为革命奉献了生命。

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中国共青团的先锋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地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建立。同时，投身各项事业中去：他们协助各界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活动，动员和组织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动和组织广大青年慰劳伤病员，发动群众性的“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活动，慰问军属烈属、挖战壕、运送物资等，为巩固和保卫苏区红色政权、巩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作出了突出贡献，在长征中，冲锋在前，贡献青春和热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创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组织，广泛团结各界爱国青年，迅速掀起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广大青年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积极加入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参加人民抗日武装和建立青年武装，走上抗日战场，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国统区、沦陷区积极开展青年运动，发展进步力量，动员广大抗日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重建团组织，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使得广大青年和团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区的广大青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革命热情高涨，勇敢投身到反击国民党

军队重点进攻的自卫战争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生产建设事业中，成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生力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团继续响应党的召唤，为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改革、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不懈奋斗。他们积极参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活动，投身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开展有青年特点的生产建设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青团各级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青年先锋们率领各条战线的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到经济建设、艰苦奋斗，为国分忧，做出了出色的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青团动员全国各族青年勇敢地承担起党赋予的时代使命，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不断加强青年思想道德建设，动员他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青年先锋们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进程中，不断争创佳绩。

奋进新时代，担当民族复兴使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鋒力量。要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共青团作为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把广大青年最广泛地聚集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怀青年，充分信任青年，对青年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新时代的青年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历史的接力棒最终会交到广大青年手中，作为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广大青年要认真自己的历史使命，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示青春奋斗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

(梁道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陆智乐: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